

孝文化对徽州宗族的影响 ——以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为例

樊程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徽州歙县棠樾鲍氏宗族是以“慈孝”闻名的望族,孝文化维系着鲍氏宗族的繁衍与发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大量出现,鲍氏宗族更加重视对孝道的践行,并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促进了宗族孝文化的传承与兴盛。徽州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作为典型案例,可以概括出其与孝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孝文化对徽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棠樾鲍氏 宗族 孝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13)02-99-06

明清时期,由于外出徽商的大量涌现及壮大,整个徽州宗族社会更加重视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使徽州宗族孝文化空前兴盛起来。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以慈孝闻名于徽州,是徽州宗族中较好地践行中华传统孝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是我们探索徽州宗族孝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试图通过清代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编修的《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以下简称支谱)等相关孝义资料,从棠樾鲍氏宗族的繁衍、发展以及其践行孝道的主要表现中,分析该宗族与孝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阐述孝文化对徽州宗族产生的影响。

一、棠樾鲍氏宗族概述

根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记载,棠樾鲍氏的祖先是青州人,因西晋青州大乱,携子孙迁至新安。“至宋,文学荣公建别墅于棠樾。越四世,而居美、居安二公,自州之西门徙焉。二公之弟居仁公徙蜀源,传五世,而昌孙公徙岩寺镇。”^[1]因此,荣公、居仁公以及昌

孙公分别为棠樾鲍氏三族的祖先,而断自荣公为始祖。

鲍氏宗族的始祖荣公迁徙至歙县棠樾以后,经过百余年的繁衍与发展,不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而且名人辈出,成为徽州地区的名门望族。

棠樾鲍氏宗族以“孝”著称于徽州。宋元之际,盗贼四起,有鲍氏父子遇贼,争相为死,贼受感动,将其二人释放。^[1]父子二人“争死”的慈孝故事,在乡里广为传颂,并被载入《宋史·孝义传》中。明初,永乐皇帝亲自刻制赞诗二首于碑上,并敕建“慈孝里坊”,予以旌表。棠樾鲍氏宗族从此以“慈孝”美名远扬。

棠樾鲍氏以宗族子弟的宦途显赫闻名。尤其是明代名宦鲍象贤,嘉靖己丑(1529)中进士,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历云南副使,累迁陕西巡抚,官终至兵部左侍郎,卒后,明王朝加赠兵部尚书。^[2]鲍象贤不仅官位显赫,在任期间,平息云南叛乱,抗击两广倭寇,屡立功绩,其事迹在《明史》、《江南通志》、《陕西通志》、《云南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清代徽州族谱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JJDZONGHE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樊程,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通志》、《徽州府志》等志书中都有记载。继鲍象贤之后,其孙鲍孟英也于万历时登科入仕,先为河南开封府通判,后为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同知,仍管莱州府海防事,由于政绩显著,天启时升至朝议大夫。

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亦出现了举族经商的局面,以及富埒王侯的大商人。例如:十二世祖鲍汪如,从事以粮易盐的贸易;十三世祖鲍万善,“少能立志,经营积累起家”^[3];十四世祖鲍邦灿,“尝挟货客汴梁”^[3];十五世祖鲍光祖,随父邦灿公经商汴梁,还有十九世鲍同英、二十世鲍寅宾、二十一世鲍世臣等皆是商人。棠樾鲍氏宗族不仅涌现出了众多商人子弟,而且富裕之后的宗族商人还传承了鲍氏宗族的孝道精神,为自己的父母、宗族尽责。尤其是清代乾嘉年间,棠樾鲍氏宗族出现了资雄一方、名著商界的大盐商鲍志道和鲍漱芳父子。他们经商富裕之后,在尊祖敬宗孝道精神的影响下,为自己的宗族捐义田、修祠堂,大行义举,促进了鲍氏宗族的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棠樾鲍氏宗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

鲍氏宗族北宋时迁至徽州歙县棠樾,随后逐渐繁衍、壮大,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极盛,尤以“慈孝”闻名,是徽州宗族孝文化兴盛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棠樾鲍氏宗族践行“孝道”的具体表现

棠樾鲍氏宗族大力践行“孝道”,涌现出诸多孝行下面主要以清代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编修的《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为中心,将棠樾鲍氏宗族践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分别叙述如下:

首先,棠樾鲍氏宗族为孝子贤孙修谱立传。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经商风尚盛行,为了维护和巩固徽州的宗族制度与统治,徽州宗族大修族谱,以凝聚族人之心,并为许多有孝行的宗族子弟专门立传。棠樾鲍氏宗族仅在清代,就于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修了两次谱牒,分别为《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而据赵华富先生的《徽州宗族研究》一书对程尚宽《新安名族志》中记载的40个宗族的忠孝楷模进行统计,棠樾鲍氏宗族有科第仕宦37人,孝子贤孙3人,节妇烈女16人,隐德义行者17人,儒林著述者3人,其在统计的40个宗族中名列前茅。^{[4](p255)}宗族通过对这些忠孝楷模的记载,宣扬了传统的孝文化,同时巩固了宗族统治。

其次,棠樾鲍氏宗族为孝子立牌坊。棠樾鲍氏宗族以孝闻名乡里,因此也得到朝廷的重视,特赐孝子坊,以旌表鲍氏宗族的孝行。在驰名中外的七座棠樾

鲍氏牌坊群中,包括鲍宗岩父子的“慈孝”坊,孝子鲍灿的“忠孝”坊,“旌表孝子鲍逢昌”坊,以及因大盐商鲍志道父子为尊祖敬宗,彰显孝道,大行义举而建的“乐善好施”坊,共四座旌表鲍氏宗族孝义行为的牌坊,其中清代两座。孝子坊所占比例之大,也表明了鲍氏宗族及朝廷对孝道的大力提倡和宣扬。

再次,棠樾鲍氏宗族极重家族礼仪,以彰显“孝道”。“礼”是封建纲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规定。其中,尤其是冠、婚、丧、祭的家族四礼,徽州宗族十分重视,并用大量篇幅,在家谱中进行详细阐述。而在家族庄严肃穆的礼仪规范中,无论是祭祀祖先的大礼,还是家庭中尊老爱幼等细小的礼节,无疑不彰显出对祖宗、对父母的孝道精神。正如清代棠樾鲍氏宗族在《世孝祠记》中,对宗族祭礼的规定:“以每岁季春、季冬朔日举行祭礼,通族咸至,俾自幼习知父慈子孝之道,不待冠而后祭也”^[5]。

棠樾鲍氏宗族在《支谱》卷十七祀事中,用整整一卷详细叙述了其在祭拜祖先时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以表达后代族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如鲍氏宗族为了尊祖敬宗,规定族人们终身都要参与祠祭、习知礼仪,“未冠八岁以上,即命与祭,俾自幼习知礼节。年七十老人不能行礼者,准祭后补拜。”^[6]而由于在祠堂祭祖是宗族最隆重的大典,参加祭祀的宗族支丁,必须衣冠整齐,庄严肃穆。据《宗谱》卷一八三中的《棠樾西畴书院仪礼》规定:“当祭,乃祖考陟降之时,各派子孙俱要肃恭致敬,不许喧哗忿争,不许讪言嬉笑。助祭人违者,罚银三分;执事人等违者,罚银五分,送祠公用”^[7]。可见,鲍氏宗族在祭拜祖先时,对严肃恭敬的礼仪是十分重视的。同时,这也是鲍氏宗族对族人们尊祖敬宗孝道精神的重视与彰显。

棠樾鲍氏宗族对家礼的规范和重视,使得宗族子弟都严格地遵守家族的礼仪和规范。如鲍宗叔“生平最重宗祫,春秋尝享,拜跪祗肃,湘笔蘋藻,必以洁诚。岁率子弟洒扫坟茔,不以年老而求逸也。”^[8]可见鲍宗叔在面对宗庙祭祀时,十分谨慎严肃,严格遵守家礼,以表达其尊祖敬宗的孝意。而在家庭行事中,鲍氏宗族子弟也极力遵守礼仪,以尽孝道。鲍翁苍成事奉父亲左右,不论寒暑,并且“执礼不愆”^[8],不让自己在侍奉父亲时,有任何礼仪的过失。鲍氏宗族子弟在家庭生活中,按照宗族要求的礼仪规范严格行事,更是用实际行动彰显孝道。

最后,棠樾鲍氏的宗族商人和妇女对孝道践行贡

献大。棠樾鲍氏宗族子弟明初就已经开始外出经营商业,并且有举族经商的传统。随着棠樾鲍氏宗族外出经商的人数增多,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大。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忘记为人子女,为宗族子弟的职责,而且这些宗族商人还将经商获得的财富,尽孝于父母,造福于宗族,将经商与尽孝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践行孝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徽州人有良好的经商传统,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商本身就是鲍氏宗族子弟践行孝道的一种表现形式。棠樾鲍氏宗族所在的徽州地区山多地少,生活相对贫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徽州地区的人们,因此鲍氏宗族子弟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供养父母,不得不外出经商。如鲍君文玉,家本富饶,但由于“其父时遭家仆盗墓事,吁讼不休”^[8],家渐贫困,文玉为了家人的生活,“行贾于外,转徙瓯粤间。”^[8]同样,明清之际的鲍寅宾亦是家道中落,而“兄弟四人,父卒于栝蓐,奉丧还里,敦勸两弟读书励行,皆为邑诸生。而自与其季服贾,以养母。”^[8]可见,徽州宗族子弟为了摆脱家庭困境,让父母更好地安享晚年,采取经商的途径致富,以尽孝道。

棠樾鲍氏宗族不仅用经商的途径,赚取钱财,尽孝于父母。富裕之后鲍氏宗族商人,还为自己的宗族做出种种义举,将义行与孝行相结合,以表达尊祖敬宗之意,彰显孝道。清代嘉庆年间,鲍氏宗族内部设置有节俭户田、体源户田、敦本户田三种义田,共1300余亩,数量巨大,都是由宗族商人捐赠设置的,以用于救济族内不同人群的公共产业。可见,经商富裕之后的族子弟,捐贖置田给宗族,为有共同祖先的族人们谋利益,是在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下,尊祖敬宗、恤族的价值观念所驱使的,这亦是践行孝道的行为。

祠堂是族人遵循朱熹《家礼》祭祀的地方,祠祭是子孙们尊祖敬宗的重要表现。因此,徽州宗族十分重视祠堂建设,而宗族子弟中富商的慷慨解囊起了重要作用。清代嘉庆年间,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的大盐商鲍志道和鲍漱芳父子出资重新修建了万四公祠,俗称男祠,只“奉男主”,不“柑女主”。鲍志道的胞弟鲍启运为了女性祖先之灵有所依托,建造清懿堂,俗称女祠。徽州商人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以及对宗族的归属感,出资修建祠堂,让子孙后代都铭记祖先恩德。更有甚者,为了向宗族子弟宣扬孝道,大盐商鲍志道还专门为棠樾鲍氏宗族历代孝子建了一座“世孝祠”。

经商之路艰辛万苦,许多徽州宗族子弟远在外经商,客死他乡,其子却能千里寻父,以尽孝道。例如据

《鲍恩锡公偕配吴孺人伯子德成公墓表》记载,鲍公经商在外,不久病逝于大梁,其子德成公“痛父卒于客邸也,哀毁骨立,走数千里,抚榱归”^[9]。之后,德成公子承父业,仍经商于楚地,并由其子鲍质庵随从,最后“卒于汉上”^[10]。“质庵偕其伯氏、仲氏扶榱返徽,迢迢千里,惊涛拍天,断岸荒驿,维舟而哭。”^[10]质庵送父还乡后,“供养老母,终其身”^[10]。无论是跟随父亲在外经商,还是回乡面对家中年迈的母亲,徽州宗族子弟都能竭尽全力,尽自己为人子女应尽的孝道。

明清时期,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地区外出的宗族商人众多,促使清代在徽州宗族妇女间节烈风气盛行。节妇在夫亡守寡之后,她们要对死者和生者承担许多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尽孝是最重要的。虽然节妇们已经丧失了夫君,但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除了要守贞节外,有孩子的妇人,还要将夫君留下的孤子抚养成成人,这样才算尽孝道。《宗谱》卷三《节烈》规定:“节烈之纪以昭妇贞示闾,则其曾蒙旌典,及合例未蒙旌者,即详载于小传,后复表而揭诸编首之。”^[11]但是,“有年已三十丧夫砥节,抚孤有成者,虽未合例,亦得附。”^[11]可见,在清代徽州宗族妇女上谱立传的规范中,对抚孤节妇的重视和提倡。此外,节妇在丈夫去逝之后,还要尽心奉养长辈,以尽孝道。

同样,徽州宗族妇女面对远在外地经商的夫君,更要承担起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等家庭的重要责任。如《鲍烈妇徐氏传》记载:烈妇徐氏的丈夫鲍观澳“贾客外,妇独养姑”^[12]。鲍恩锡的妻子吴太君在丈夫客居他乡经商后,“则舅歿,事姑尤谨。”^[2]除了尽心尽力地奉养亲人,还教育儿子要孝顺父母。吴太君的儿子德成公受母命经商在外,帮助父亲。父卒后,行千里送亲归。回家后,侍奉母亲亦竭力尽孝。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子弟外出经商之后,妇女在家庭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责任,她们不仅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在丈夫去世后,严守贞节,而且依然要在家中孝敬父母、抚养子女,极尽孝道,以传承中国传统的孝文化。

三、棠樾鲍氏族人重视践行“孝道”的原因

棠樾鲍氏宗族之所以大力重视“孝道”的宣扬与践行,并涌现出如此多的孝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1、深受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徽州地处万山之中,陆路交通不便,少兵焚之虞。中国历史上,由于中原地区战乱,曾出现过三次人口大规模南迁高潮,中原大族多迁至此。徽州宗族不断发展、繁荣,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正如清代学者赵吉士

在《寄园寄所寄·故老杂记》中所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14](p872)}因此，中原世家望族传统的孝文化，也深深地根植于徽州地区。

如前所述，棠樾鲍氏宗族的祖先亦是由于西晋时，其所在居住地青州发生战乱，才携带家眷迁至徽州。祖先是来自中原地区，因此棠樾鲍氏宗族继承了以“孝”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随着子孙后代在徽州地区的繁衍与发展，孝文化也传承下去。棠樾鲍氏自始祖荣公起，世代以孝义传家，因此，历代出现了闻名于乡里的慈孝之举。除了前面所提到宋元之际，父子争死的慈孝事迹，还有元代“元风公尝弃妻子，负母入山避乱，乱定归，妻子俱无恙。”^[5]明代，鲍氏名宦（鲍象贤）之祖父灿公，“吮母疽，获愈”^[5]；“叙廉公病，三到股疗之。后父歿，其椁左墙茁三异葩。”^[5]到了清代，“逢昌公又以孝行受旌”^[5]，朝廷并赐建“旌表孝子鲍逢昌”坊。无论任何朝代，任何后代，践行孝道，宣扬孝行，都是棠樾鲍氏宗族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对其的继承与发扬。

2、朱熹思想中对“孝”的提倡，成为徽州宗族重视孝道的依据。朱熹祖籍婺源，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对徽州地区影响深刻。朱熹是宗族制度的坚强维护者，在他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与等级制度等内容，在宗族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其中尤其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与内容，成为徽州宗族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了棠樾鲍氏宗族对孝道的践行。

朱熹思想中对“孝”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修谱之风的形成。南宋时期，朱熹指出：“人家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矣。”^[15]经朱熹倡导之后，这一观点遂成为徽州宗族必须遵守的教条，许多宗族每隔一段时间即修一次谱牒。棠樾鲍氏宗族仅在清代一朝，就于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两次大修谱牒，分别为《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

此外，朱熹的《家礼》是宗族对族人日常生活及行为，进行控制与约束的重要礼仪规范，其内容也是孝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棠樾鲍氏族人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侍奉父母，都严格遵守朱熹《家礼》的要求、规范，以践行孝道。而朱熹思想中对“孝”的大力提倡，使得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妇女面对远在外地经商的夫君，更承担起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等的家庭责任，甚至还因此出现了许多贞洁烈女。

正是由于朱熹思想中关于“孝”的内容及规范，广泛传播于宗族之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才推动了孝文化在徽州宗族中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兴盛。

3、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举族经商，为“孝道”的践行提供了物质保障。由于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宗族践行孝文化提供了良好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支持。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他们从小就在宗法制严格的宗族中生活，接受的是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教育，即使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宗族，外出经商至全国各地，儒家的宗法伦理和传统文化也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在徽商看来，经商首先是力行孝道的一种方式，他们最初的动机往往是“服贾以奉父母”^[16]，承担起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棠樾鲍氏宗族商人即使在经商富裕之后，仍不忘继承儒家的孝文化，宣扬和践行孝道。他们出钱、出力，大修谱牒，为宗族多行义举，这也是其尊祖敬宗、恪尽孝道的重要表现。

编修谱牒是一项工程浩大、任务繁多、千头万绪的工作，特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族修谱，每每都是多卷本、大部头，而且需要大量的经费。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由歙县棠樾、蜀源、岩镇鲍氏三族修纂的《重修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竟多达二百卷，首一卷，二十册，耗银 3564 两^[17]，纂修这样大部头的谱牒，离开鲍氏宗族商人的大力支持，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徽州宗族商人还为宗族多行义举，如捐置义田、修建祠堂等。从《宗谱》、《支谱》中可以看出，棠樾鲍氏经商者众多，尤其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盐商鲍志道“由困而亨”^[8]，富裕之后“修宗祠，纂家牒”^[8]，义举不断。在他之后，还有鲍启运、鲍漱芳等大盐商相继而起，为鲍氏宗族做出许多贡献，以彰显孝道，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棠樾鲍氏宗族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有如此深厚的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底蕴，再加上朱熹思想中对孝的大力倡导，以及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商人提供的大量物质支持，鲍氏族人才能如此大力地宣扬和践行“孝道”。

四、孝文化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地区是程朱故里，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孝文化对徽州宗族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巨大，再加上徽州宗族子弟对孝文化良好的践行，徽州孝文化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同时，徽州孝文化的兴盛，反过来也对徽州宗族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有利于古代徽州社会的和谐稳定。孝是中国封

建社会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孝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孝文化建设,采取各种措施提倡和宣扬孝道,以达到孝治天下。由于徽州地区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徽州宗族重视孝道,并且很好的践行了孝文化,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有利于宗族内部的团结互助。徽州宗族对孝文化的宣传和倡导,使得中国优良的传统得以传承。孝文化在宗族各代间互相影响,以至于出现了家族世代行孝的现象。如《鲍翁苍成传》的作者记载:“予客扬州,获交鲍封君肯园,知其先世,自尚书公以下累世孝义,为歙县名族之最。”^[8]这样,孝文化在维系宗族团结发展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力量。

正因如此,徽州宗族的孝文化使得即使是远离他乡、富裕之后的徽州商人,仍不忘尊祖敬宗,为宗族子弟的利益着想,为自己的父母极尽孝道。这样,发迹以后的徽商,反哺家族,宗族子弟之间相互扶持,促进了宗族内部的团结与互助。同时,由于徽州宗族子弟大量外出经商,妇女在家担起抚养子女、奉养父母的责任,也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盐商鲍启运为了棠樾鲍氏宗族的女性祖先,建造了女祠清懿堂;大商人鲍志道之妻专设义田,以救济族内妇女。

孝文化影响下的徽州宗族,在外经商者,不忘自己身为宗族一员,对父母尽孝,对宗族尽义务;而在家持家的妇女更是孝敬长辈,抚养子女。这些都促进了家庭的稳定和宗族内部的团结、互助。

3、有利于古代社会的管理。徽州孝文化,对整个徽州宗族的建设和管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为了凝聚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之心,收集散居各处的族人们,通过宣扬尊祖敬宗的孝道精神,大修谱牒,以达到加强宗族管理的目的。此外,徽州宗族还在族谱的编纂中,加入了族规家法等内容,尤其是对族人们践行孝道的规范。棠樾鲍氏宗族的《宗谱》与《支谱》中虽未有明确的族规家法,但是在义田《公议敦本户规条》和《公议体源户规条》中,含有族规家法的内容,如对孀居有子的妇人,给予义田;而孀居亲戚家者,不准领给;盗卖祖坟者,永不准给等等,间接宣扬了孝道,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宗族统治。

4、有利于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徽州宗族对孝道的实际践行,也将孝文化发扬光大。棠樾鲍氏宗族世代传承孝文化,不因朝代的更替而中断。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增多,为

了加强宗族统治,棠樾鲍氏宗族更加重视孝文化,通过纂修谱牒,修建祠堂、牌坊等多种方式宣扬孝道精神,将孝文化发扬光大。而在宗族孝道精神的影响下,外出的棠樾鲍氏宗族商人,以及在家持家的宗族妇女对“孝”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践行,这些都使得棠樾鲍氏宗族孝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宣扬与传承,并发展到兴盛。

5、古代徽州孝文化的消极影响。从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角度来看,徽州宗族中倡导的孝文化,也有它消极影响的一面。本来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属于一种自然情感,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孝”的过分强调,以至于徽州宗族子弟间出现了许多割肝、割股疗亲的愚孝行为。而这些行为不仅没有被禁止,还被作为一种美德,得到鼓励和表彰。因此人人竞相模仿,对人的健康和人性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伤害。此外,徽州宗族的孝文化在一些方面对妇女的束缚过严,使得许多徽州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为了抚养孤子、孝顺公婆,不能改嫁,终身过着孤独、贫困的悲惨生活。与此同时,由于清代徽州宗族孝文化的影响,使得徽州商人将经商获得的大量资本,投资到为宗族尽孝的建设之中,甚至为了光宗耀祖,大兴土木,许多宗族祠堂和居家宅院,十分奢侈豪华,浪费了大量资金,使得用于再生产的资本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歙县棠樾鲍氏是徽州非常著名的慈孝宗族,《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中关于鲍氏宗族“孝行”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徽州宗族孝文化的兴盛状况。同时,棠樾鲍氏宗族的繁荣、兴盛,也反映出徽州宗族孝文化,在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宗族统治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研究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重要课题和内容,非常值得学术界关注与探讨。

【参考文献】

- [1](嘉庆)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Z].清嘉庆十年刻本.
- [2](嘉庆)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Z].清嘉庆十年刻本.
- [3](嘉庆)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三[Z].清嘉庆十年刻本.
- [4]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 [5](嘉庆)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二[Z].清嘉庆十年刻本.
- [6](嘉庆)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十七[Z].清嘉庆十年刻本.

- [7](乾隆)鲍光纯.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八三[Z].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8](嘉庆)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Z].清嘉庆十年刻本.
- [9](乾隆)鲍光纯.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八七[Z].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0](乾隆)鲍光纯.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八五[Z].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1](乾隆)鲍光纯.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三[Z].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2](乾隆)鲍光纯.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八八[Z].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3]赵华富.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J].江淮论坛,1993(2).

- [14]赵吉士.寄园寄所寄[M].合肥:黄山书社,2008.
- [15](同治)金山洪氏宗谱:卷一·金山洪氏宗谱后序[Z].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 [16](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Z].清同治九年刊本.
- [17](乾隆)鲍光纯.重编歙县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二百·刊谱输金[Z].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责任编辑:王印东)

(上接第 98 页)

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如表 1 所示,该框架包括 4 个一类指标,18 个二类指标(三类指标不再详列)。每个指标具有类型、分值、权重等属性。

指标类型标识指标的重要程度,分为核心级、普通级和扩展级。核心指标通常是信息化建设中必须的内容,是其它指标的基础,如基础设施类的 A1、A2 项,资源建设类的 C1 项等。普通指标属于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可以分步建设、延后建设的内容,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转变成核心指标,普通指标如 A4、A5、C2、C3、D4 等。扩展指标是指有特色性或前瞻性的内容,如 B3 项、C3 项下的新农村教学资源建设等。扩展指标是随着党校信息化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变为普通指标或核心指标,如“云计算”、移动办公平台等。

前置指标是为反映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承接关系而提出的概念,当 B 指标依赖于 A 指标的完成时,则 A 指标是 B 指标的前置指标,如基础设施中的大部分指标是技术应用、资源建设中指标的前置指标,B1 中的数字化采集系统是 C2、C3 的前置指标等。前置指标由表格序号索引。若没有前置指标,则为空。

信息化建设是党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全国各级党校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加强党校信息

化发展的组织领导、理论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校信息化发展,以良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开展党校信息化建设,才能打造党校干部教育新平台,提高党校干部教育水平,推进党校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校工作[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7/content_10262292_1.htm.
- [2]蒋笃运,张豪锋等编著.教育信息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第 1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3]郭英楼.中央党校信息化建设的回顾与展望[N].学习时报,2007-11-20.
- [4]赵祥好,吴斌.关于党校信息化发展战略的研究[J].理论建设.2011(5).

(责任编辑:童亚军)